

从“抑商”到“重商”观念的转变

——龚自珍、魏源、王韬、郑观应经济思想个案简析

申满秀

鸦片战争后,列强的大炮轰开中国闭关自守大门的同时,也唤起了中国有识之士对祖国命运的关注。他们开始反思传统社会的弊端,并把目光转向外部世界,致使当时的士林思想发生了剧变。首先变化的就是传统的以重农抑商为核心的、以本末、义利、奢俭等封建伦理道德为补充的经济思想。但从“抑商”到“重商”的转变历程,充满曲折和反复。本文试图从近代几位著名人物的思想变化,粗略地勾画出这一转变轨迹。

—

鸦片战争前后,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始摆脱汉学和宋学的束缚,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此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龚自珍。

龚自珍在猛烈抨击社会现实的同时,极力要求“更法”、改制、实行摆脱“厄运”困境的“自改革”^①。其中的经济改革主张是,要消除“贫富不相齐”的现象,须尽快解决日益严重的流民问题。在《平均篇》、《宗农》等文章中,他深刻揭示了造成“贫富不相齐”的原因是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并进而指出,如果“贫富不相齐”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会使“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发为兵燹,为疫厉,生民喙类,靡有孑遗,……小不相齐,渐之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②。为解决这一迫在眉睫的矛盾,他提出了“宗农”的主张。龚自珍的“宗农”,并非“平均主义”,而是“贫富齐之以礼”,即按封建等级来规定贫富之差,用家族宗法的社会组织形式,重新调节土地分配^③。即按宗法地位,将社会成员划分为“大宗”、“小宗”、“群宗”、“闲民”四个等级,凡为农者均有田亩,由长子继承,立为“大宗”;次子为“小宗”,别请田二十五亩“给小宗”;第三、第四以及次之次子为群宗,也“别请田二十五亩”;第五子以下以及群宗之次子以下则为“闲民”,不授田,世代为佃。其中,大宗“役佃五”,小宗“役佃一”,“佃同姓不足,取诸异姓”^④。

这套主张,是把龚氏之前的许多人指出的人民不能谋生,就会造成社会动乱及产生动乱的诸多原因抽象为一个根本原因——“贫富大不相齐”,并将造成“大不相齐”的原因归咎于商业,把矛头指向了大商人。

他心目中的商业是以经营“服妖”(奇装异服)、“食妖”(鸦片)、“玩好妖”(奇技淫巧)等店铺为代表,还包括卖官、卖淫和欺世盗名等行为在内。这等于把商品经济看成是国民经济的有害部门。他把大商人称为“魁”、“臬”,说这些人“其心皆欲并十家、五家之财而有之”,是兼并势力的主要代表,并认为由于他们的兼并活动,才使得社会上出现了富人和穷人的差别。^⑤

龚氏还专门设计了限制商品流通的方案:“百家之城,有银百两;十家之市,有钱十缗;三家五家之堡,终身毋口畜泉货可也”^⑥。他还设想,如此行之三十年,“富民所吝惜,非货焉;贫民欲羨怨叹,非货焉”,经商者将“退而役南亩”。由于大家不再追求货币财富,天下也就不再“扰

扰贫与富之名”^⑦了。

正是这种排斥商品经济的思想,在对外贸易问题上,他主张只在广东“留夷馆一所,为互市之栖止”,尽量缩小对外贸易范围。他认为,“中国与夷人互市,大利在其米,此外皆末也”^⑧。他以为只许洋米进口,进口商品就少,对外贸易就会顺差,白银就不会外流。基于这种狭隘的贸易观,他对西方的机器工业产品采取排斥态度。

当时社会上确实存在商人的兼并现象,但由此而否定整个商业的积极作用,反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只看到商人兼并而看不到地主兼并,显然是错误的。

龚自珍的理想社会,仍然以自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农业为最主要的经济部门,商业只占非常次要的地位。龚氏这种尽量缩小商业规模、限制货币的作用的主张,实际上是把传统的抑商思想引向极端。在自然经济迅速向商品经济过渡的世界大势下,龚氏“抑商论”是违背历史发展方向的。

龚自珍这个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进步思想家,其“讥切时政”拉开了近代变革思想的帷幕,但为什么他的经济改革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呢?

我认为,龚自珍生活的主要时期是在鸦片战争前,自幼饱受儒学熏陶,长期生活于封闭式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农业社会,对欧美的变化及世界潮流一无所知,尽管他“讥切时政,抵排专制”的时文使人“若受电热”,但他主要是想使清王朝“振刷纲纪,弘扬圣武,建立四夷来王”的一统天下。所以其经济改革主张,只能在传统的封建的自然经济的硬壳内盘桓辗转,这是龚氏的局限,也是当时许多具有变革意识的进步士人的共同局限。

二

鸦片战争爆发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开始渗入中国东南沿海部分地区,使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受到冲击,同时也使部分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解西方,学习西方,此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魏源。

魏源不仅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还提倡“崇利”哲学,为冲破“抑商”的藩篱首开门径。

首先,他把“王道”和“富强”结合起来,他说:“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王伯之分,在其心不在其迹也”^⑨。把“富强”作为儒家政治思想“王道”所必需的实际内容,并抨击了当时儒家末流空谈仁义、王道的学风。

其次,把“利”与“仁”并列,认为“利”与“仁”都是儒家的核心内容。他说:“圣人利、命、仁之教,不谆谆于《诗》、《书》、《礼》,而独谆谆于《易》。《易》其言利、言命、言仁之书乎?‘济川’,‘攸住’,‘建候’,‘行师’,‘取女’,‘见大人’,曷为不言其当行不当行,而屑屑然惟利不利是诏?……世疑天人之不合一久矣,惟举天下是非、臧否、得失一决之于利不利,而后天与人和”^⑩。这种对儒学新的诠释,无疑对传统儒学是一个冲击。

再次,他首先提出了治国必须依靠富民的主张。他说:“使人不暇顾廉耻,则国必衰;使人不敢顾家业,则国必亡。……《周官》保富之法,诚以富民为一方之元气,公家有大征发,大徒役皆倚赖焉,大兵燹、大饥馑皆仰给焉。……故土无富户则国贫,土无中产则国危,至下户流亡而国非其国矣”^⑪。他特别推崇依靠“无田之富民”。他说:“有田而富者,岁输租税,供徭役,事事受制于官,一遇饥荒,束手待尽;非若无田富民,逐什一之利,转贩四方,无赋敛徭役,无官吏挟制,即有与民争利之桑(弘羊)、孔(仅),能分其利而不能破其家也”^⑫。抒发了他对自由贸易理想的憧憬之情。

最后,他还一反崇俭禁奢的传统美德,倡导崇奢。他说:“俭,美德也;禁奢崇俭,美政也;然可以励上,不可以律下;可以训贫,不可以规富。……车马之驱驰,衣裳之曳娄,酒食鼓瑟之愉快,皆巨室,贫民可以通工易事,泽及三族”^⑩。在他看来,富民的奢侈消费是贫民的衣食之源,是两者活动的交换。

魏源虽倡导崇利哲学,但对如何学习西方的经济制度、发展商业的问题却只字未提。他虽有一些“议行海运,改革弊政”的主张,如认为在海运的方法上可雇商船代运,以商运代替官运,以商道为运道,甚至提出:“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⑪的见解,但这种对商人利益的肯定态度仍未脱离封建的“惠商”主义的窠臼。他虽也认识到西方列强“兵贾相资,遂雄岛夷”^⑫的现状,但他的思想深处还是传统的儒学观点。魏源在《国朝古文类钞序》中就认为“《六经》为文章的辰极”,也“不轻言变法”,主张:“惟去法外之弊,弊去,而法又复其初矣”^⑬。他虽发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千古绝唱,但他不曾想过要从根本上改变封建经济制度,只是企图为挽救民族危机寻找一条出路,即对外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以抵御外侮;对内,发挥商人的积极性以除积弊。总之,魏源的经济改革主张尚未突破传统思想的藩篱。

三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加大了对中国的商品倾销,“1894年比1864年增加了两倍半,而同期中国的出口商品却只增加了1.6倍”^⑭。由于接触到较多的资本主义实际,“自强”遂成为朝野越来越多人呼声。还有人提出了学习西方的主张,并把“师夷之长技”推进到了学习西方的经济制度的更深层次上。此时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

王韬(1828—1897)由于有着旅居西方国家的经历,又潜心研究西学,70年代起,就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奉行的“重农抑商”政策,进行批判。他指出:“西国之于商民,皆官为之调剂翼助,故其利溥而用无不足;我皆听商民之自为,而时且遏抑剥损之,故上下交失其利”,惟有“一反其道而行之,务使利权归我”,才能“国强民富”^⑮,他进而指出,封建社会“重农”的实质是“徒知丈田征赋,催科取租,纵悍吏以殃民,为农之虎狼而已”^⑯。他还把“兴利”与传统的“民本”思想结合,响亮地喊出了与民共利的口号,主张“以商力濬利源”^⑰,把“开掘煤铁五金诸矿”、“制造机器,兴筑铁路,建置大小轮船”的利,“皆云之于民”^⑱,并首次提出了“商富即国富”^⑲的命题。

王韬还对死抱重农抑商信条不放的顽固派进行抨击。他说:“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也,上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古,中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三代”,“至今日而欲办天下事,必自欧洲始。以欧洲诸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⑳。只有学习西方富强之道,“兵力,商力二者并用,则方无意外之虞”^㉑。不仅如此,王韬还指责洋务派对商业的垄断,竭力主张“官办不如商办”,允许“民间自立公司”,“不使官吏得掣其肘”^㉒,认为洋务派只不过是简单抄袭西法,只抓住了西法之末(军事),未抓住西法之本(经济)。

对于如何发展商业的问题,王韬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建设和设想。由于时代局限,他和其他早期改良主义者一样,未能将工与商截然分开。所以王韬的商业理论上包括了工矿、交通银行等发展近代工商业的内容。他提出了广贸易以重货财,开采煤铁五金之矿,修筑铁路,造购车船,设保险以广招徕,改招工以杜弊病等措施。这些改革构想都在后来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实践中得到了实施。

王韬还认为商富是国富之源,并明确指出西方国家“兵力之强”,“全在商力之富,以商力裕兵力”^㉓。中国要“富民强国”,必先“富商”,“商富即国富”。治国要依靠富商,“今夫富国强兵

之本,系于民而已矣;^⑦,因此要“恃商为国本”。^⑧他还肯定了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明确提出“要令富民出其资,贫民殫其力”^⑨。王韬所说的“民”显然已不是传统说法中的“农民”,而是新兴的“商民”以及供“富民”剥削的雇佣劳动者。这充分反映了刚刚兴起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

难能可贵的是,王韬在70年代后期朝野上下“反外侮”的呼声中,大声疾呼“自握其权利”,“收西商之利,而复为我所有”^⑩,还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治民之要,在乎因民之利而导之,顺民之志而通之,善于治民者莫如英”^⑪，“唯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愈吁磋,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焉”^⑫。

在龚自珍、魏源去世二三十年以后,王韬终于冲出了封建经济思想的藩篱,首次提出了虽不完整但却崭新的经济思想,这正是改变了的经济事实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因为在王韬生活时期的中国,洋务派被迫充当起了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拓者的角色,兴起了洋务运动。在官督商办的洋务企业中,出现了中国近代第一批私人资本投资者。同时在洋务企业外,也出现一批私人资本经营的小企业,从而产生了中国早期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私人资本的愿望和要求,必然要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反映出来。王韬的经济思想正是当时已经形成的物质条件的产物。

四

自王韬揭开了批判传统的封建经济思想的序幕之后,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接踵而出。他们纷纷著书立说,杂陈时务,使得“重商主义”“重工主义”的思潮遍及当时士林。其中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郑观应。

郑观应担任过洋行的高级买办,又是一个民族资本家,既参与洋务企业的经营,又是一个改良派思想家。经营近代工商业65年的丰富阅历,使他的经济思想成了集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之大成者。

郑观应对封建的“重农抑商”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其批判的基点是:“时势不同”,“在古寓兵于农,今寓兵于商”^⑬。“稽古之世,民以农为本,越今之时,国以商为本”^⑭。“古人所谓商,……非今所谓商也,……居今世而概念商务,其情势有不可同日语者矣”^⑮。他的批判,具有浓厚的进化史观的色彩。以此为基础,他进而主张:“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⑯?他还建议“变隆古之习,视商如土”^⑰,国家要“富我商民”,“卫我商民”^⑱。

郑观应在批判封建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了同西方诸国开展商战的思想:“习兵战,不如习商战”^⑲，“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⑳。他主张,“一法日本,振工商以求富,为无形之战;一法泰西,讲武备以图强,为有形之战,知己知彼,战守无虞,自然国富兵强”^㉑。

“商战”思想,既是其经济思想的核心,也是对王韬、薛福成、马建忠等早期改良派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首先,郑观应吸取了王韬把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归纳为“兵力”和“商力”并用的说法,以及“彼所患者,不在我之兵力,而在我之商力,盖恐我国以商力与之争衡耳”^㉒的独到见解,提出了用“兵战”对付其军事侵略,用“商战”对付其经济侵略的“用两手对付两手”思想。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强调了发展经济对于反抗侵略的基础决定作用,这正是对王韬“恃商为国本”的明确阐述。

其次,郑观应进一步发挥了薛福成关于振兴商务必须发展工业的思想,强调了工、商二业

的相辅相成,“有工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否则即是“徒弃已利以资彼用而已”^{④3}。因此,在郑观应的“商战”思想中,对发展机械制造为主的工业实业特别重视。

再次,郑观应发展了马建忠重视对外贸易的思想,认为发展对外贸易是进行“商战”的主要形式,极力主张仿郊马建忠的“精求中国固有之货,令其畅销”,“仿造外洋之货,敌其销路,务必收到“出口货多,进口货少”^{④4}的外贸实绩。

在郑观应的“商战”思想中,还有很多顺应时代潮流的卓越见解。

首先,他针对封建专制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巨大阻碍,尖锐地提出了“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④5}。为此主张“君民共主”。因为,“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权得共丰”^{④6},这说明郑观应已经意识到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发展的能动作用。

其次,他对洋务派奉行的“中体西用”提出了尖锐批评:“西从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而效其用,所以事多扞格,难臻富强”^{④7}。这充分说明了他的经济思想已经超越了洋务派经济思想的窠臼。

第三,郑观应反对政府包办商务,主张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凡是商民要求自主经营的,都应允准。他主张“凡通商口岸,内省腹地,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④8}。尽管郑观应在举办工商企业的实践中,曾一度主张“官督商办”,但在他的内心深处,推崇的仍是“商贾之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对“官督商办”的“官场体统”则深恶痛绝^{④9}。郑观应这种在理论主张和实践操作上的巨大差距,与其说是郑观应的软弱,不如说是郑观应在“官本位”社会中的务实和清醒。

最后,郑观应还主张仿行西方的公司制来发展我国的民族经济,“英国颁行公司定例甚善,我国亟宜通饬仿行,以杜奸商舞蔽也”^{⑤0}。可见郑观应已认识到,发展近代工商业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经营体制。

从郑观应上述言论和主张中可以看出,郑观应的经济思想既有创新性,又有务实性,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士人中的先进分子群体已经从观念上完成了从传统的“重农抑商”向近代“重商主义”的转变,而且标志着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基本形成。

龚自珍、魏源、王韬、郑观应,都是同时代进步士人中的佼佼者,他们匡时救国的思想和主张,都是当时思想界的最强音。但是,从龚自珍“宗农”的经济思想到郑观应的近代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形成,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艰难历程。究其原因,主要是“经济的事实”转化和形成的艰难,以及传统思想观念的潜在束缚,因而在他们的经济思想中,既有顺应时代的闪光火花,又有因循守旧的陈迹旧弊。

他们的经济思想基本构成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形成序列,其间的因袭和发展脉络是相当清晰的:他们从“忧患时事”的爱国情感中萌生出了刷新弊政的使命感,其除旧布新的改革主张也从空疏转为实际,最终选择了既同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和联系,又集中全力发展工商实业的务实主张。从他们的思想中,我们既可感受到他们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感和富民强国的务实精神,又可领悟到他们不懈地追求和选择的胆略与智慧。

(作者:申清秀,贵州省教育学院讲师,邮政编码:550003)

[责任编辑:明秀丽]

(下转第47页)

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动态的有机系统。

(本文为 1999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人的活动研究》的部分内容)

(作者:龚振黔,贵州财经学院副教授。邮编:550003)

[责任编辑:王路平]

注:

-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27、96、37 页。
-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362 页。
-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33 页。
-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327 页。
-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405 页。
-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87 页。
- ⑨〔保〕尼科洛夫:《人的活动结构》,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 年版,第 46 页。
-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32 页。

(上接第 86 页)

注:

- ①龚自珍云:“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熟若自改革”。《乙丙之际著议第七》《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6 页。
- ②《平均篇》,《龚自珍全集》,第 78 页。
- ③④⑥⑦龚自珍:《宗农答问第一》、《乙丙之际熟议第十六》。
- ⑤⑧《龚自珍全集》,第 79—80、170 页。
- ⑨⑩⑪⑫⑬《魏源集》,第 36、20、72、72—73、73 页。
- ⑭《海国图志·筹海篇三》。
- ⑮《海国图志》第 25 卷。
- ⑯任访秋:《龚自珍与魏源》,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2 年第 5 期。
- ⑰叶世昌:《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 79 页。
- ⑱⑲《弢园尺牍》,中华书局 1959 年 85、124 页。
-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弢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45、125、22、25、13、111、301、301、300、300、299、22、299 页。
- ㉛《戊戌变法》(一),第 149 页。
- ㉜《弢园文录外编·重民下》。
- 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版,第 55、599、592、592、593、(91、97)、568、598、588、967、967、612 页。
- ㊺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 1,中华书局 1960 年版。
- ㊻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自序》。
- ㊼郑观应曾写到:“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华商因此不及人,为丛驱爵成怨府”参见《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商务叹》,《郑观应集》下册,第 1369 页。
- ㊽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五》。